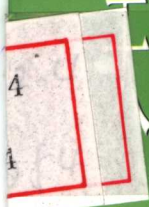


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 Notes from a Mud Hut



[英]奈杰尔·巴利著

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



·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

天真的人类学家

—小泥屋笔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英)巴利(Barley,
N.)著;何颖怡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书名原文: The Innocent Anthropologist

ISBN 7-208-04298-5

I.天... II.①巴...②何... III.社会人类学—科
学考察—随笔 IV.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5675号

责任编辑 田青

封面装帧 杨德鸿

•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

天真的人类学家

——小泥屋笔记

[英]奈杰尔·巴利 著

何颖怡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29,000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4298-5/C·135

定价 15.00元

导读 人类学家的天真与 原住民的天真

黄道琳

十多年前,在美国旧书店偶然买到《天真的人类学家》的英文本。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作者巴利是何许人,但从该书的内容简介看来,我陆续在收集的“异类”人类学著作又要增加一本。没过多久,我也拥有了《天真的人类学家》的续篇 *Aplague of caterpillars*。^{*}

巴利于1977年至1979年间两度前往喀麦隆多瓦悠族聚落,从事仪式和信仰方面的民族志调查,这两本书记录了他将近两年的田野经验。人类学家原本就很少将他们在田野的日常生活点滴形诸文字,巴利的著作则更在这个小小的文类里头独唱异调。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学家带头助长或至少在旁默许,人们对田野经验的理解充满了浪漫、神秘、冒险等等色彩;而今,在巴利的笔下,民族志调查纵非只

* 编注:英国 Henry Holt 出版社的版本书名为 *Ceremony*。

是徒劳一场(他确实没有消极到这个地步),也泰半耗费在闲散、挫折、困顿的泥淖里。

可想而知,这样的告白不会得到人类学界的欢迎。果不其然,巴利遭受了不少专业上的严厉指控,包括说他在书中明言某某报导人(informant)嗜酒或性无能是违反职业伦理的做法。就这一点而论,巴利确有可议之处,但如果真的要落实伦理的要求,那我看所有人类学家多少都有过失。让我提出一个较有意思的解读:巴利所以会那么冒犯人类学家,是因为他对这些人造成伤害,然后进一步加上侮辱。伤害在于他用幽默带刺的笔调揭露了人类学家的窘态和尴尬,侮辱则在于他这样做却得到广大读者的喝彩。

不只喝采——根据一项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所做的调查,巴利竟然是英国大学生最熟知的人类学家,其知名度甚至高出列维—斯特劳斯。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学著作的读者群和普及度越大,其作者就越会受到同行的轻蔑(米德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巴利能够获得大众的青睞,那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在书中可不像其他人那样宣扬人类学的崇高使命和深奥意涵,而仿佛只是把他的经历拿来当作娱人的话题。对那些以人类学为专业的学者,这怎生了得?

在此替巴利说句公道话。巴利从田野回来之后,也出版了一本中规中矩的民族志专著(*Symbolic Structur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Dowayos*)。如今读来,这本书的内容倒相当契合人类学的理论取向和分析架构,但它对多瓦悠文化的阐明,也不过是提出一些机械式的结构和语

意上的对比。若要认识有血有肉的多瓦悠人以及巴利个人的切身感受,读《天真的人类学家》会更有收获。

但愿人类学家多写几本这样的书。曾经有一位前辈鼓励我:只要做过三天田野,就可以写出一本书。这固然是夸张的话,却也道出了民族志研究的盲点。毕竟,回溯历史来看,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曾经是获取知识的革命性方式,只要善加运用绝对是效率很高的利器。但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往往对其研究方法过度自信,以为一旦做了一段时期的参与观察便得以洞识文化的奥秘,尤有甚者,有些人类学家还仗着田野调查这把尚方宝剑,对其他学科嗤之以鼻。

平心而论,如果人类学家对其田野经验抱持既轻松又笃实的态度,再加上某种程度的写作工夫,那么确实可以、也应该为广大读者撰写不少兼具启示及趣味的书。起码,他们在某些方面也不妨扮演旅游作家的角色。《天真的人类学家》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种书难得一见?我相信,那是因为大部分人类学家使命感太强,致使他们不敢坦然面对或公开承认调查过程中所遭遇的顿挫、困难及其成果的不确定性;少了这些成分,他们的田野报告仿佛是按照食谱规规矩矩、妥妥当当做出来的菜肴。再者,人类学界理论挂帅的风气颇为强烈,你辛辛苦苦做了一两年田野之后,岂能放弃任何分析这个、诠释那个的机会?因此,我们在人类学家著作中碰到不少粗鲁的分析和过度的诠释。

也许,在巴利面前我不应该讲这些有点粗鲁、过度的批评言辞;因为,巴利其实并不太在乎其他人类学家的作为,

他着墨较多的反而是对自己的调侃，而且笔下充满幽默和反讽。再说，这一趟田野虽然让巴利受尽种种挫折和打击，他却能够在过程之中逐渐调整心态，原先的忿忿不悦终于化解为逆来顺受。巴利跟喀麦隆政府官员及私人机构打交道时老是得到无理或无能的处置，这些描述可能也会令读者读得咬牙切齿。其实，这类遭遇是司空见惯的事，只是人类学家很少事前设想或被告知这种情况，因此未能预先计划应付的门道。

到最后，无论巴利在多瓦悠文化的研究上是否收集到令人满意的资料，他至少对喀麦隆社会这一重要层面有了丰富的体验，并用不愠而超脱的态度跟我们分享这些。

田野工作者最大的挫折，来自他跟当地人的关系，而这正是人类学家最不愿意触及的问题；说得明白一点，乐意跟调查者密切合作的原住民实在可遇不可求，大部分人在行为上往往只是敷衍了事，在言辞上经常难免含糊矛盾。别的人类学家或是畏于泄底、或是认为研究成果比过程重要，总是把这些情事扫进地毯下，《天真的人类学家》着重的却正在于此。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非但同意巴利赋予人类学家的“天真”形象，恐怕也可以把提供资料的当地人视为“狡猾”的化身。

多瓦悠人似乎乐于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也不时颠三倒四，害得巴利不是无所事事，就是莫衷一是。

巴利把这些和盘托出，似乎对多瓦悠人颇有谴责之意，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也很有度量地迁就——这退一

步讲是田野工作者不得不做的妥协,进一步讲则是对研究对象应有的尊重。由于巴利不怕揶揄自己,他的叙述更能让我们了解田野情境的一项要素:享有优势的人类学家对处于劣境的原住民不能有职业性的苛求,因为后者被卷入这个情境基本上不是出于自愿,而他们如果令人类学家感到失望,那也是无奈的局面。进而言之,巴利也暗示了田野情境的一个陷阱。人类学研究以实地调查所得的材料为最高判准,因此原住民的观点和所提供信息乃是最有力的依据;但是,调查者终究会发现,能够直接从原住民口中得到的东西实在不多,而且不清不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到现在还是一门相当不准确、颇有几分天真的学科。从巴利的故事我们只能达到这个结论,然而分享了他的田野经验之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正是人类学迷人的地方。何谓人类学?或许它就是人类学家的天真与原住民的天真所碰撞出来的知识。

《天真的人类学家》受到一般读者的欣赏,但它若要获得专业学术肯定,恐怕还得借助某些理论标签的提升。这本书原著出版于1983年,大约在那时候人类学里开始流行起所谓后现代、反思式的民族志,其重点在于强调田野调查的暧昧性以及调查者自身对民族志材料所施加的影响。二十年下来,原本有望为人类学注入新生机的这种取向,也已大致走入了死胡同。这类著作虽然对田野调查的可信度提出正当的质疑,但最终却过度强调研究者自身的主宰性,而使民族志知识的客观地位几乎完全沦丧。

巴利跟这些民族志作家的关怀其实没有什么重大的差

别,而他会在那个年代发表这本著作,也同样反映了人类学论述方式在当时所受到的普遍质疑。不同的是,后现代民族志难免沉溺于矫情的反思,最终成为作者自恋的呓语,巴利则采取较释怀的反讽立场,他看待问题的方式表面上看来只是戏谑有趣,骨子里却很严肃健康地交待了田野工作的局限和希望。

如果说巴利这本书对人类学的最大贡献,我想那应该是它使我们对民族志研究抱持着带有怀疑的兴趣以及附加条件的信心。巴利自己隐隐之中似乎也为这做了见证:这次田野结束时,他显然已经是个不再那么天真、而有几分疲倦畏惧的人类学家;不过,只在六个月之内,得知有重要的仪式可供研究,他又信心百倍、兴致勃勃地回到多瓦悠族人之中了。

那也是一段颇有可谈的经历。但,那是后话了。

(本文作者为台湾“中央研究院”

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序 人类学、文学以及游记

作者/乔纳森·斯多克 译者/周倩而

或许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看这本书。第一种可能开始于这样的场景：当我读此书时我忍不住大笑，笑歪了嘴，最后我甚至笑得从椅子上跌下来了。真的，这是我这辈子读过的最好笑的书之一。本书作者，英国人类学家奈杰尔·巴利拿到研究经费去研究西非冥顽强悍的多瓦悠人的割礼仪式。代之学术研究，他选择用日记式的方式，以敏锐而诚实、感性而率直幽默的笔调，记录他每日面对的多瓦悠人。摒弃了繁琐的学术书写风格，巴利将所有理应被删除的内容：如意外事件和倒霉事（足够拍成一部好莱坞喜剧），生病初体验（足以编写成一部医药百科全书）和因异文化而产生的误解（也可以编写成电视肥皂剧）都翔实地描述于本书中。这还不包括我尚未提到的他与非洲官方人士及其他西方人士的奇遇呢！

本书有很多思考点均刺激着读者反省自我对外在的认识。例如，我们常常浪漫地以为，非洲部落的人们比都市人

爱护自然。但当多瓦悠人问起,为什么巴利不把机关枪也连同其他田野工作的必需配备一起带来,以便快速而有效地猎杀野生动物时,我们对非洲人疼惜自然的刻板印象便顿时一扫而净。从这里我们看到多瓦悠人十分自信自己做事方式的正当性,但当他们一丝不苟地坚持这才是惟一的方法时,有时不免令人感到可笑,巴利发现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其实,反过来想,他们的顽固不也如同我们自己一样?人类共同拥有的优劣及特有的文化样貌在巴利纯熟的妙笔下像一面明镜,借着他自己,一个人类学者生活在异文化的经验,反射出种种类似的盲点与反思。作者用清新的手法及斟酌的字句让读者觉得自己亲临一个未经策划过的事件,原原本本地呈现事情发生的原因与始末。什么是人类学,而学者又是如何了解一个异文化的,无所不在地潜藏在作者的字里行间,虽然这与作者称这是一本无关人类学的声明是矛盾的。

从第二种角度来介绍,可以说我掴了自己一巴掌。早在18世纪90年代就有评论者说人类学像旅游写作。是的,除了学术化的注脚、参考书目和理论框架是旅游札记所没有的,评论中肯地显示民族志写作就像其他的写作,作者试着将一群鲜为人所知的人们介绍给另一群可能从未接触过他们的读者。这样对斯土斯民的侧面描述不可能是客观或科学的。相反,它是依靠着因作者的人格特质所洞察的素描,因作者偶然结识几个特定对象与之产生互动所累积的结论。举例来说,曾有一个笑话提到,澳洲和英国男性学者写道,新几内亚的男性是粗犷而

专横的。反之,女性研究者与男性美国犹太学者却说他们有迷人的魅力与活力。多么科学、客观的结论是不是!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信息,作者的确需要多提供些关于他自己的资讯。到底他是如何与被他研究的人进行互动的,这样的脉络陈述得以让读者了解为何学者下如此结论。关于所有运气不佳及误会,还有田野工作发生的琐事通常不会被呈现在书中因为这些都被看做是个人的,与研究主题无关的,其实可能都与后来的研究结果息息相关——它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作者因此下了某种结论。所以,对于了解什么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这是一本相当优质且易读的入门书籍。

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第一版发行于1983年,在英国人类学界,算是第一批将人类学视为一种重视人性成长觉醒的学科的人文科学及文学作品。直到现在,我们仍在探索相关论述的新发现,而这本书在现今仍然具有许多重要的意义。同此理,此书的中文版也因类似的理由刺激人们对人类文化的更深层领悟。就像巴利理解到的,新的书写风格开发了潜在的新读者群。纵使作者风趣的写作风格可能失之轻率,巴利确实是很小心谨慎地在向读者传达关于人类学的几个重要问题与假设。总的来说,这是一本罕有的综合性的书:它让你瞬时地被吸引并产生深刻的印象;会让你捧腹大笑但又有掷地有声的内容。不论是人类学的学生或专家,或是有经验的旅行者,或是靠读旅行札记的卧游寰宇者,或是对于现代非洲有兴趣的读者,或是为打发无聊而找书的上班族(但小心别错过你的车

站,这可是一本一拿起就很难再放下的书),我相信你们都能在此书中得到一些收获。

(本文作者为英国设菲尔德大学民族
音乐学教授,《世界音乐》书评编辑)

目 录

导读 人类学家的天真与原住民的天真	黄道琳 1
序 人类学、文学以及游记	乔纳森·斯多克 7
第一章 原因何在	1
第二章 准备	10
第三章 上山	15
第四章 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	24
第五章 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领	35
第六章 你的天空晴朗吗?	50
第七章 啊,喀麦隆:祖先的摇篮	67
第八章 跌到谷底	99
第九章 非洲总有新把戏	118
第十章 仪式与错误	124
第十一章 雨季与旱季	148
第十二章 第一批与最后一批收成	170
第十三章 英国异乡人	187
译后记	196

第一章 原因何在

“为何不去做田野调查？”一次众人带着醉意的讨论接近尾声时，一位同事抛出以上疑问。那次我们广泛讨论人类学最新技术、大学教学与学术生涯。结论令人沮丧。就像哈巴德太太^①(Mrs. Hubbard)，我们清点存货，却赫然发现橱柜空空如也。

我的故事十分寻常——受训于高等学府，非经刻意规划，而是机缘使然进入教书行业。英国的学术生涯奠基于几个经不起考验的假设。首先：如果你是优秀学生，便会成为不错的研究者。第二，如果你的研究做得不错，书就铁定教得不坏。第三，如果你善于教书，便会渴望去做田野调查。上述关连统统不成立。优秀的学生有时研究成果可怕。学术表现杰出，名字经常出现在专业期刊上的研究者，有时教起书来愚蠢乏味到让学生以脚投票，像非洲艳阳下的晨露般消失无踪。人类学行业也不乏全心奉献的田野工作者，他们的肌肤被炎热气候烤干如皮革，牙龈因长年与原住民奋斗而终日紧咬，但是他们却对人类学理论殊无贡献。我们这些依据文献研究完成博士论文、文弱的“新人类学

者”认为所谓的“田野调查”其重要性被夸大了。当然，在殖民时代有过实践经验、“无意间搞起人类学”的老教授坚持田野调查的“神祇崇拜”不可毁，因为他们是这个行业的大祭司。他们可是受尽了沼泽、丛林的磨炼与贫困，自以为是年轻学者岂容抄捷径。

每当这些老教授在理论或形而上学的辩论场合被逼到墙角，便会悲哀摇头，懒洋洋抽烟斗或抚弄胡须，喃喃说道“真人”无法嵌进“从未做过田野调查者”的纯粹抽象概念里。他们对无缘踏入田野的人满怀同情。事实很简单，他们曾到过田野，他们看到了。没什么好说的。

我在人类学系教了几年学来的正统学说，殊乏学术成就，或许也该改变了。你很难判断田野工作是类似当兵这类的不悦任务，理应默默忍耐，还是这行的“额外红利”，应该欢喜承受。同事的意见帮助不大。他们有足够时间为回忆蒙上乐观光环，让田野经验变成浪漫冒险。事实上，田野经验正是乏味的证书。举凡洗衣服到治疗普通感冒等事，在田野工作者嘴中道来，如果不掺点民族志回忆的调味润饰，那可叫周遭亲友讶异失望了。老故事变成老友，很快地，田野经验便只留下美好回忆（除了某些奇怪岛屿的状况极度悲惨，叫人无法忘怀也无法消融于幸福感中）。譬如，某位同事宣称与和葛原住民共度了很棒时光，他们微笑着携带一篮篮水果、鲜花来送礼。如果按照事情发生顺序，这段叙述应当补充如下：“那是在我食物中毒后。”或者：“当时我的脚趾起水泡脓肿，虚弱到无法站立。”如此种种不免叫人怀疑：田野调查

这回事是否像那些欢乐的战争回忆,叫人扼腕生不逢时,虽然理智上,你知道战争不可能美好。

或许田野经验还是有好处的。它可以让我讲课内容不再拖拉无趣,当我必须传授陌生的课题时,可以像我的老师般,把手伸进装满民族志轶事的破布袋,炮制出一些曲折复杂的故事,让我的学生安静个十分钟。田野经验也会赐我贬抑他人的全副技巧。每每思及此,我的脑海便涌起一段回忆。那是一个即便以寻常标准来看都十分乏味的会议,我与数位优秀同行礼貌聊天(包括两位阴郁的澳洲民族志学者)。似乎经过预谋,同行一一告退,只留下我面对两位澳洲“恐怖分子”。经过几分钟死寂,我试图打破冷场,提议一起喝杯酒。其中一位女学者马上一脸苦相,嘴角痉挛,厌恶地大喊:“不要!我在丛林里喝够了。”田野工作的最大好处便是让你俯拾可得这类渺小人们无缘使用的句子。

或许就是这些怪句子,使得本质乏味的人类学冠上珍贵的怪诞脱轨气息。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学者的公众形象实在侥幸。众所周知,社会学者缺乏幽默感,是左翼狂想与陈腐之言的大买办。但是人类学者曾追随印度教圣者,看过奇特神祇与污秽仪式,大胆深入人迹未达之处,他们全身散发一股崇高气息与神圣的不切题,他们本身就是英国怪诞教会的圣者。我岂能轻易拒绝成为其中一员?

凭良心说,我也考虑了其他好处(虽然机率不大),譬如田野工作可对人类知识有所奉献。乍看之下,这种可能性极低。“资料搜集”(fact-gathering,或译事实搜集)的工作殊